

六、结语

1947年至1965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基于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宗旨，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联系，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时至今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¹并被确认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内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与挑战，这也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提出了更重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些阶段性特征和挑战，我们仍然应该坚定道路自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²新形势下，我们仍然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本质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掌握的政治方向，坚持七十年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³我们在新形势下思考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大局中来把握，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地承担起其在新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中的光荣使命。

【网络文章】

造“国民”与造“民族”不可偏废

《三联学术通讯》“我的日常阅读”特辑 10

<https://mp.weixin.qq.com/s/CF8Rc7CmX2pypevswNj1DA> (202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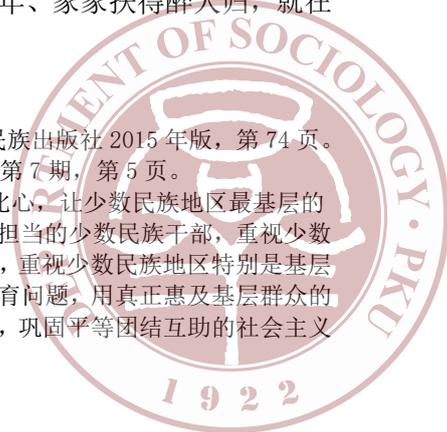
郑少雄

1月18、19日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行建所四十周年学术庆典；20日晚我的父母在闽南乡下大宴宾客庆贺乔迁；21日晚我进城参与接待了一位远道来莆田寻根的学者；22日晚我又到沿海参加一场更大规模的乡村婚礼，由于当地全国性的同乡同业网络，婚礼参加人可能来自所有省份包括整个湖北。这些日子，每一天都吉祥、盛大、稻花丰年、家家扶得醉人归，就在

¹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²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第5页。

³ 如民族工作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重在交心、将心比心，让少数民族地区最基层的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培养和大胆使用政治过硬、德才兼备、敢于担当的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少数民族基层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将发展作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基层地区的民生问题，着力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尤其是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用真正惠及基层群众的措施来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群众的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们饮下最后一滴美酒的同时，23日凌晨，武汉宣布封城，瞬间繁华落尽，一切社会生活被按下了中止键。

自此我在闽南乡下蛰居迁延一整月，除了关注疫情发展，饱食终日，无书可读，也无心读书。挈妇将雏“冒险”返京，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期间为写文章，草草看了几本和羌族有关的书，或多或少都涉及汶川大地震，在当下苦难的历史场景中，尤为令人心痛，也令人生别样之况味。

这别样的况味是，每一场大型灾难，常常轻易被、或只被引导为人类共同之敌人，从而抹杀了弱小边缘群体在同一灾难中特殊的、往往也是更惨重的遭遇。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封城之后，为数不少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就很长一段时间不为当地和外界所关注，导致他们流离失所、求告无门；解封之后，健康的湖北人依旧处处受到限制和歧视，不得返工挣钱。与此相似，汶川地震固然更是一场自然灾害，但且不说震区中最无辜的中小学生，就以族群为例，羌族人常常就认为汶川地震“似乎是针对着羌族而来”（王明珂《寻羌》），“这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重灾区又正好落在我们我们羌人的聚居地！这是宿命，这是天意？”（高屯子《羌在深谷高山》）。羌族人产生这种想法是有原因的，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自己的族群被迫不断迁徙，却始终夹在汉藏文化板块、同时也是自然地理板块之间无法逾越，从而成为发生在两大板块断裂带上的大地震的最大受害者。换言之，看似普遍的自然灾害背后其实隐藏着特殊的族群（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权力。

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引出族群（民族）的议题。如果“羌族”是“真”的，那么他们的抱怨或许天经地义；如果“羌族”是“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已经成为“社会事实”的真实的“民族”情感？恰巧，王明珂（《西北民族研究》2019.02）和马戎（《开放时代》2020.01，另有完整版本见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300期）两位教授相互应和，以民国时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留下的田野杂记、日志为基本材料，专文讨论了造“民族”与造“国民”之别。虽然二位先生批评的力度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都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选择了造“民族”这一比较便捷的途径，而于造“国民”一途收效略差。尤其马戎教授更是直陈，造“民族”客观上将导致边疆各部之离散，从而损害中华国族之建构。

我在疫情期间的阅读，恰巧就包括了两位教授分析过的书，另外还有王明珂教授自己的学术专著和田野杂记，以及和王教授颇有学术酬答的“地方”知识分子的书和电影。

“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之初，黎光明受该所课题委托，与其伙伴王元辉赴今四川阿坝地区做民族学调查。黎光明虽供职于史语所，却只是一名大学刚毕业、热衷于交际和“侈谈政治”的年轻人，调查也做得很不专业，一再受到所长傅斯年的训斥，而且调查结束不久即离开了史语所。这一本浅显通俗的田野报告被束之高阁七十四年，如今读来却颇为幽默清爽。王明珂和马戎都指这一报告显示两位作者边疆考察的真正目的在唤醒边胞、塑造国民，而非如芮逸夫、乃至傅斯年等人之志在区分及识别少数民族，并且认为除了价值立场之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作者在流动和比较中发现，土民、羌民、杂谷人、乃至獐狲子等群体，与周边的西番、汉人其实并无明显的“民族”差异，从而无法成其为民族。

关于 nation、民族、国族在中国之误译、误解、误用，已经被讨论很多了，但是这本书中透露的一些信息还是值得进一步分析。一方面，除了作为自明前提的中华民族外，《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还在其下两个层次直接使用民族概念：一是西藏民族、羌民族；二是作为“西藏民族的一支”的西番民族、土民民族，作为“西藏民族的子孙”的杂谷民族等。另一方面，尽管人群之区别本来是明晰的，如西番各部领土内的土地只限于西番才能互为买卖，决不能卖给汉人，土民的兵田决不能卖给羌民或汉人等，但是作者也意识到西番、羌民之间处于“变迁的痕迹”之中，羌民和土民也有“互为同化的痕迹”、土民向汉人“蜕化的痕迹”等。这也表明，以黎和王为代表的时人关于民族的概念认知和实质所指，可能并非如今人所认为的源于某种阴谋或失误，



而是无意中与当下族群理论已经颇为接近，既牵涉主观认同，也暗含范畴的逐层嵌套和伸缩性，还承认民族边界的模糊性与可变性。

《羌戎考察记》也被认为体现了造“国民”的倾向。庄学本是一名摄影家，1934年原打算入藏考察旅行，未能实现后改赴川西北及青海，《羌戎考察记》即此行成果之一，所谓羌戎大体指的是今天阿坝的羌族和嘉绒藏族。庄是上海人，熟悉电梯、非洲、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却称第一次见到的果洛“野番”为精神高洁、可敬可亲的“同胞”，羌戎“蛮子”为“隔离较远的乡下兄弟”。这个细节显示，庄氏对“异族”生出了某种根基性的情感或曰想象的血缘关系，其所认知之国族，实在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无疑。

或许可以说，可能正是因为黎与王在学术上不够专业，以及庄氏的非专业性，没有像专业学者那样受到彼时大行其道的民族学理论概念的限制，反而可以对真实的民族体系有更清晰、更具反思性的认识，也更符合现实政治情境。所以，大约也可以说，并非黎和王所见的民族缺乏民族差异，反而是差异始终存在，只是差异的内容、形式和尺度在不断变动之中。

王明珂教授考察他人的田野日志和杂记，是因为他觉得“在田野日志与杂记的书写中，记述者较不遮掩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感觉及看法，因此与作为最终调查成果之‘民族志’相比，田野日志与杂记更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及知识产生过程有所反思”。

尽管《羌在汉藏之间》在学术上明确认为，“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但在相当程度上，王明珂还是承认不管是族群、民族还是国族，都是广义人类“族群”现象的一部分。而且，边疆人群的少数民族化，其实有其近代以前的历史基础和延续性。在最新的论文中，王明珂已经比较鲜明地主张造就有认知与反思能力的“国民”（实为 citizen）尤为重要，这一倾向的逐渐转变似乎不难理解，在他看来，固化的民族认同容易导致情感超越理性，从而对内抹杀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与暴力，对外滋长危险的民粹主义。

理智如此，情感却不尽然。《寻羌》描述具体的考察路线和经历，关注活生生的个人作为，有几个北川的故事令人莞尔又让人哀恸：一是报导人、县委干部董先生热心为作者做“蛮子”的食物“荞麦馍馍”，以此证明作为骄傲的少数民族的羌族传统和独特性；二是一位老人解放初作为藏族村长去成都参加民族会议，收到了胡耀邦赠送的一件藏袍，后又被重新确定为羌族，面对作者却仍然念念不忘自称“我们藏族……我们藏族”，被另一位报导人、民宗局干部王先生抱怨道，“跟他们说了好多次了，他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三是一位羌族老人和作者相识后，写了一首四言绝句请有学问的王教授指教，以此夸耀自己地道的汉文化根源。虽是法律上的羌族，却分别自认为羌、藏、汉，这些栩栩如生的故事实在比民族志要可亲得多，所包含的信息也丰富隽永得多，表明唯一的身份确认并不能涵盖不同羌族个体所寻求的多种生命可能。北川本是汉化比较彻底的地区，1953年羌族只占总人口的0.07%，随着1980年代羌族认同勃兴，2000年已增至48%，2003年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其中就有两位报导人的重要功劳。汶川地震发生，其实北川受灾尤重，董先生死难，王先生数年前就已致残却艰难死里逃生。面对“羌族人”在狭窄板块夹缝中的苦痛遭遇，王明珂教授在扉页引用羌族古诗《尼萨》关于地震的唱词，难道不是对羌族人寄寓了特别的理解和同情吗？

这两个作品也是汶川地震的产物。

高电子是阿坝松潘的汉人，松潘正是前面几本书用力最勤的地方，这个事实自然让人类学者既兴奋又沮丧：“土著”知识分子的表达欲望和书写能力一点都亚于外来学者，而且他们竟然还会拍照，还会拍电影！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和《寻羌》二书的封面用的都是民国老照片，而到《华夏边缘》增订版的封面已经是高电子拍摄的图片了；他夸奖《羌在深谷高山》是一本“实验民族志”，并且还担任了与自己的书同名的电影《寻羌》的顾问。去年《寻羌》横扫几大纪录片及民族志电影节，专业人类学界内部多少有些争议甚至批评，但不妨碍它真实地撼动了观众的感情。高电子来社会学所放片并座谈，我不少理性的学者同行都哭了。



《羌在深谷高山》拍摄并记述羌族的迁徙、栖居、以及乡村宗教人物“释比”（端公，巫师）的神圣生活，《寻羌》则反映整体搬迁到四川腹地的羌族村民，震后十年之际在释比的率领下返回故土寻根的故事。高屯子是个复杂的人，他可能曾经是佛弟子，走的是普度众生的路子；现在可能是儒者，倾向于天下大同。按照他自己的表达，《羌在深谷高山》和《寻羌》未必只关注某一具体民族，他甚至也不认为一直有那么一个历史羌族——或许是社会科学家的影响，而是借羌族在表达整体中国的古风雅俗，大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意。意虽如此，但是仔细揣摩高屯子的文字、照片和电影，却会发现，如果抽掉了“羌族”特殊性，也即如果不着力刻画其长时段颠沛流离的迁徙记忆，不聚焦羌族作为最大地震受灾者的形象，其艺术感染力可能会大打折扣。几乎可以说，不仅是造“国民”，甚至可能造“众生”和造“天下”，都需要取道造“民族”来达成。

造“民族”vs. 造“国民”，或许始终不能摆脱进一步的追问：

造“民族”被视为情感性的、区分性的，必欲弃之；造“国民”则被视为理性的、融合的，弦而鼓之。但其实情感与理智、区分与融合俱是人类特质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也无法偏废。更何况，“国族”也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情感容器，在更大的规模上造成对立与冲突，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中并不鲜见。此外，如果说民族内部的根基性情感或想象的血缘关系，会掩盖民族内部的剥削、不平等和暴力，在国族内部又何尝不是？

抗战危急时期的争论，论证了造“国民”的优先性和紧要性，甚至也论证了其天然合法性。承平时期，又当若何？家族、族群、民族、国族、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个空间都是人的结合地，空间越多元，人类才可能在遭遇任一层力量的挤压时，找到可能的藏身之所。正如肺炎疫情危重期间，人人自觉自愿隔离在家，但可以说明人们愿意终生封闭吗？大疫初缓，性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走出家门，毕竟春天几乎已经来了。

【网络文章】

涉及民族关系的中英文词汇的再认识

《当代世界》2011年第02版（《学习时报》转载）¹

赖海榕（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我国在“民族”、“族群”、“族裔”等词汇的应用上存在与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相冲突的情况，在国际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在国内可能导致认同发生分歧，应引起重视。

一、“多民族国家”应该称为“多族群国家”

“民族”一词，即，英文的“nation”，国际上普遍的理解是与“国家”（即 state）相提并论的词汇，只是所指方面不同，“民族”指人民，“国家”指政治机关，民族和国家的称谓是一体的。所以跨国公司的英文称谓是“multi-national company”，联合国叫“united nation”，美国篮球协会叫“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注意其中的“nation”一词，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我国在1960年代以前很多翻译著作，均把“nation”译为“国族”。近代民族-国家革命以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每个民族-国家内不同宗教、肤色、人种、历史起源属性的人群被称为“族群”，英文为“ethnic group”。所有现代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自称为“多族群国家”（英文为“multi-ethnic nation”或“multi-ethnic state”），没有称作“multi-nation”

¹ <http://www.doc88.com/p-7774210574414.html> 或 <http://www.docin.com/p-467180797.html> （2020-4-7）